

中國現代哲學史

資料匯編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五册）

东西文化论战

主编 钟离蒙 杨凤麟

一九八一年七月 沈阳

目 录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李大钊 (1)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屈维它 (瞿秋白) (7)
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	瞿秋白 (12)
泰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	瞿秋白 (18)
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	瞿秋白 (22)
无用的人与东方文化	瞿秋白 (22)
过去的人——泰戈尔	秋白 (24)
文明与道德	恽代英 (25)
告欢迎泰戈尔的人	代英 (28)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陈独秀 (31)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陈独秀 (33)
复辟与尊孔	陈独秀 (34)
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陈独秀 (36)
附录一 中西文明之评判	平佚 (39)
附录二 功利主义与学术	钱智修 (42)
附录三 迷乱之现代人心	仓父 (46)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陈独秀 (49)
附录 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	仓父 (55)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陈独秀 (57)
孔教研究	陈独秀 (58)
学术与国粹	陈独秀 (59)
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	陈独秀 (60)
泰戈尔与东方文化	实庵 (陈独秀) (61)
论中德文化书	郭沫若 (62)
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	郭沫若 (66)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郭沫若 (70)
整理国故的评价	郭沫若 (71)
泰戈尔来华的我见	郭沫若 (72)
忽然想到	鲁迅 (75)
灯下漫笔	鲁迅 (77)
台我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	愈之 (80)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	定一 (81)
对于泰戈尔的希望	雁冰 (85)
泰戈尔与中国青年	泽民 (86)
泰戈尔来华后的中国青年	亦湘 (91)
评“人类第三期之世界”	泽民 (92)

“文艺复兴”？	林 根 (96)
梁漱溟的造孽	廉 生 (96)
什么是文化工作	昌 群 (98)
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	蒋侠僧 (101)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	梁漱溟 (104)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三版自序	梁漱溟 (106)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八版自序	梁漱溟 (107)
附录：人心与人生自序	梁漱溟 (108)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 (110)
欧游心影录（节选）	梁启超 (204)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 (209)
什么是文化	梁启超 (213)
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东西文化之比较观）	冯友兰 (216)
文明或文化	张申府（张崧年） (219)
西方文明与中国	张东荪 (224)
思想问题	东 荪 (225)
由自利的我到自制的我	张东荪 (226)
兽性问题	张东荪 (231)
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	张君勱 (235)
中国哲学史大纲（绪论部分）（见《唯物论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的斗争》）	胡 适
论国故学——答毛子水	胡 适 (239)
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胡 适 (240)
附录一 梁漱溟先生第一次来书	梁漱溟 (248)
附录二 答 书	胡 适 (248)
附录三 第二次来信	梁漱溟 (249)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胡 适 (250)
附录：机器与精神	林语堂 (256)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胡 适 (260)
整理国故与“打鬼”	
——给浩徐先生的信	胡 适 (265)
附录一 西滢跋语	(267)
附录二 主客答问	浩 徐 (269)
东西文化的结合	台莪尔著 子 貽译 (269)
责梁漱溟	恶 石 (279)
国故和科学的精神	毛子水 (282)
“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毛子水 (288)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七年七月言治季刊)

李大钊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溯诸人类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谓为基于自然之影响。盖人类生活之演奏、实以欧罗细亚为舞台。欧罗细亚者欧亚两大陆之总称也。欧罗细亚大陆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棹地”(Table Land)此与东西文明之分派至有关系。因其地之山脉不延于南北、而亘乎西东、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人类祖先之分布移动乃以成二大系统、一为南道文明、一为北道文明。中国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诸国、俾路麻印度阿富汗尼斯坦俾尔齐斯坦波斯土尔其埃及等为南道文明之要路。蒙古满洲西北利亚俄罗斯德意志荷兰比利时丹麦士坎的拿威亚英吉利法兰西瑞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士大利亚巴尔干半岛等为北道文明之要路。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薄、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不能不转徙移动、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住的。惟其定住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前者女子恒视男子为多、故有一夫多妻之风、而成贱女尊男之习。后者女子恒视男子为缺、故行一夫一妻之制、而严尊重女性之德。农业为主之民族好培种植物、商业为主之民族好畜养动物。故东人食物以米蔬为主、以肉为辅、西人食物以肉为主、以米蔬为辅、此饮食嗜好之不同也。东人衣则广幅博袖、履则缎鞋木履、西人衣则短幅窄袖、履则革履。东方舟则帆船、车则骡车、人力车、西方舟则轮船、车则马车、足踏车、火车、电车、摩托车。东人写字则用毛笔砚池、直行工楷于柔纸、西人写字则用铅笔或钢笔横行草书于硬纸。东人讲卫生则在斗室静坐、西人讲体育则在旷野运动。东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试观东人西人同时在驿候车、东人必觅坐静息、西人必来往梭行、此又起居什器之不同也。更以观于思想、东人持厌世主义(Pessimism)。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个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人持乐天主主义(Optimism)。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为向上进化发展、确认人道能有进步、不问其究竟目的为何、但信前事惟前进奋斗为首务。东人既以个性之生存为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天命是谓定命主义(Fatalism)。西人既信人道能有进步则事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是谓创化主义(Creative Progressionism)。东人之哲学为求凉哲学、西人之哲学为求温哲学。求

凉者必静、求温者必动。东方之圣人是由生活中逃出、是由人间以向实在、而欲化人间为实在者也。西方之圣人是向生活里杀来、是由实在以向人间、而欲化实在为人间者也。更以观于宗教、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东方教主告众生以由生活解脱之事实、其教义以清静寂灭为人生之究竟。寺院中之偶像、龛前之柳、池中之水、沉沉无声、皆足为寂灭之象征。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寻出活泼泼地之生命、自位于众生之中央、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之奋斗。更以观于伦理、东方亲子间之爱厚、西方亲子间之爱薄。东人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人以满足自己为人生之本务。故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更以观于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制众人之愿望、使之顺从。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有数年更迭之元首之代议士、有随民意以为进退之内阁、政治现象刻刻流转、刻刻运行。随各个人之意向与要求、聚集各个势力以为发展。东人求治在使政象静止、维持现状、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动之观则诋之以捣乱。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泼、打破现状、演成一种活秩序、稍有沉滞之机则摧之以革命。东方制定宪法多取刚性、赋以偶像之权威、期于一成不变、致日新之真理无缘以入于法。西方制定宪法多取柔性、畀以调和之余地、期于与时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随时可合于理。此东西文明差异之大较也。

东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挟种族之僻见以自高而卑人。近世政家学者颇引为莫大之遗憾。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輊于其间。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二）惰性太重、（三）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五）对于妇人之轻侮、（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权之偏重、（八）专制主义之盛行。而其所长则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以窥见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觉沉静与安泰。因而起一反省、自问日在物质的机械的生活之中纷忙竞争、创作发明、孜孜不倦、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魂之最深问题者究竟为何。东西文明之互争雄长历史上之遗迹已数见不鲜。将来二种文明果常在冲突轧轹之中、抑有融会调和之日、或一种文明竟为其他所征服、此皆未决之问题。以余言之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所谓本身之觉醒者即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

印度开放而后西洋思想已渐蒙东洋之影响。如叔本华 (Schopenhauer) 之厌世哲学、尼采 (Nitzsche) 之天才个性主义皆几分染东洋思想之颜色。惟印度之交通不便、西人居印者少、而印人之视英人只认为娴于政治艺术之巧练蛮人、以为论及修养彼辈尚属幼稚。彼辈所汲汲以求者东方人决之于心中也久矣。故东西文明之间在印度不生密切之接触。逮于海通、西人航海来华者日众、东西思想之接触始渐密切。良以吾国气候之温和、海路之利捷、远非印度可比也。由是言之对于东西文明之调和吾人实负有至重之责任。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

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一九一六年九月八日美德加父教授 (Professor Maynard W. Metcalf) 曾在奥柏林 (Oberlin) 为中国留美学生会演说《科学与现代文明》论及中国之将来有曰：“设有一民族于世界最终之民族中能占一大部者其惟中国人乎。其数量之众、忍苦之强、衍殖之繁、爱重和平之切、人格品性之坚、智力之优、与夫应其最高道德观念之能力、皆足以证其民族至少亦为最终民族中之要素。但彼等究与启发未来最终民族生息于其下之文明型式以若何之影响乎？中国其将于智于德有所贡献于世界、亦如其于数量乎？此殆全视彼善导其发育于今方环接之新境遇下之成功何如耳。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今犹能卷土重来以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乎？世间固尚未有一国民能于世界之进步为第二次伟大之贡献者。埃及阿西利比亚佛呢西亚希腊罗马亚拉比亚波斯皆曾达于极盛之域而遂衰亡不复振。独意大利之文艺复兴为显著之例外。然亦非旧罗马之复活、逮其纯为新民族之日固不知有几多异族之血混入古意大利人之族系也。犹忆三十年前加潘特 (Edward Carpenter) 曾为文以论《文明之起原及其救济》甚有趣味。文中指陈曾经极盛时代民族中文明疾病之径路、谓此等文明之疾病大抵皆有其相同之预兆时期、浸假而达于炎热最高之度、浸假而貽其民族以永世削弱之运焉。世界史中尚未见有回春复活之民族重为世界之强国也。

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讳言。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然知吾人苟欲有所努力以达此志的者其事非他、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

今日立于东洋文明之地位观之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吾侪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例如火车轮船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之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凡此种种要足以证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而一察其现象则又呈扞格矛盾之观、到眼都是。最近所发生之社会现象如飞虹、普济、江宽等轮之冲沈也、某处火车之遇险也、某处电灯之失慎也、此类事实若一一叩其原因固各不一致，而且甚复杂，就生活现象以为大量之批评则皆足引为吾人不适于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证据。其他大至政制、微至衣履、西人用之则精神焕发、利便甚溥、而一入于吾人之手、著于吾人之身、则怪象百出、局促弗安、总呈不相配称之观。盖尝推原其故、以为以静的精神享用动的物质制度器械等、此种现象必不能免。苟不将静止的精神根本扫荡、或将物质的生活一切屏绝、长此沈延、在此矛盾现象中以为生活、其结果必蹈于自杀。盖以半死带活之人驾飞行艇、使发昏带醉之徒御摩托车、人固死于艇车之下、艇车亦毁于其人之手。以英雄政治贤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肃静无哗唯诺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议政治、以万世一系一成不变之观念运用自由宪法、其国之政治固以机陞不宁、此种政制之妙用亦必毁于若而国中。总之守静的态度持静的观念以临动的生活必至人身与器物、国家与制度都归粉碎。世间最可恐怖之事莫过于斯矣。

余既言之、物质的生活今日万不能屏绝勿用、则吾人之所以除此矛盾者亦惟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然在动的生活中欲改易一新观念创造一新生活其事较易、在静的生活中欲根本改变其世界观、使适于动的生活其事乃至难。从而所需之努力亦至大、吾人不可不以强毅之气

力赴之。

奇普陵(Kipling)之诗曰：

“Oh,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Till Earth and sky stand presently

At God's great judgment seat,

But there is neither East nor West,

Board, nor Breed nor Birth,

When two strong men stand face to face

Tho' they come from the end of the Earth.

译其大旨、即谓除非天与地立于上帝最高裁判之席前、东终是东、西终是西、绝无相遇之期。但有二伟人焉、虽来自地球之两极、相对而立、则无东西畛域之见、种族血系之分也。吾青年乎其各以 Two strong men 中之一人自命、竭力剔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此种技艺与产业足致吾人之日常生活与实验之科学相接近。如斯行之不息、科学之演试必能日臻于纯熟、科学之精神必能沦浚于灵智。此种精神即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一切事物无论其于遗传之习惯若何神圣、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时时创造、时时扩张、以期尽吾民族对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贡献。

愚文既已付印、偶于《东方》第十五卷第六号见有《中西文明之评判》译自日本《东亚之光》其首段曰：

有中国人胡某者于开战前后在德国刊行德文之著作二种一名《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辩护》为开战前所刊；一名《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为开战后所刊者。

欧美人对于民族多以为劣等国民偶或见其长处则直惊以为黄祸、其真倾耳于东洋人之言论者极少。有时对于东洋人之言论呈赞词者多出于一时之好奇心、或属外交辞令而已。

然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对于他人之批评虚心袒怀以倾听之者亦较多。胡某之著作在平时未必有人过问、而此时却引起相当之反响为赞否种种议论之的。……次乃介绍德人对于辜氏著作之意见赞成之者则有台里乌司氏及普鲁克陀尔福女士；反对之者则有弗兰士氏。其中所论颇足供愚文之参证为幅帙所限未能逐录读者可取《东方》阅之。往者愚在日京曾于秋桐先生《说宪》(一)文中得悉辜鸿铭氏有《春秋大义》(二)之作嗣以激于一种好奇之心理尝取辜氏之书略为披阅。虽读之未暇终篇、但就其卷头之纲目导言之大旨观之已足窥其概要。彼谓“西洋之教人为善不畏之以上帝、则畏之以法律、离斯二者虽兄弟比邻不能安处也。逮夫僧侣日多、食之者众、民不堪其重负、遂因三十年之战倾覆僧侣之势力而以法律代上帝之权威。于是继僧侣而兴者则为军警焉。军警之坐食累民其害且过于僧侣、结果又以酿成今日之战。经此大战之后、欧人必谋所以弃此军警、亦如昔之屏弃僧侣者然。顾屏弃军警之后其所赖以维持人间之平和秩序者将复迎前曾屏弃之僧侣乎？抑将更事他求乎？为欧人计惟有欢迎吾中国人之精神、惟有欢迎孔子之道。”是篇所举胡氏之说与辜氏之说若合符节。胡氏疑即辜氏之误。辜字译音颇与胡近。其书既以英文出版于北京、复以德文出版于柏林。日人展转译致讹录胡、国人不察亦以胡某受之。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锤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一之为奇、宁复有偶、必为辜氏之讹无疑。

愚读欧人对于辜说之评判不禁起数种感想：第一国人对于现代西洋最有价值之学说恒扞格不相入、诋排之惟恐不及。而我以最无价值之梦话一入彼欧人之耳彼皆以诚恳之意迎之。或则以促其自反、或则以坚其自信、虽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要皆能虚心袒怀资为他人之助。以视胶执己见夜郎自大之吾人度量相越之远有非可以道里计者、故吾人对于欧人之注意辜说惟当引以自愧、切不可视为“惊动欧人之名论”以自荣。第二西洋文明之是否偏于物质主义、宜否取东洋之理想主义以相调剂、此属别一问题。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例如以不洁净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不重物质之证、则吸食鸦片之癖亦何不可数为相同之例、是非欲腐化世界而何？）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第三希望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勿令欧人认此陈腐固陋之谈为中国人之代表。第四台里乌司氏谓“人虽有采用新税制新服制者而无轻易采用新世界观者”斯言诚不尽妄。但愚以为于吾东方静的世界观若不加以最大之努力使之与动的世界观接近、则其采用种种动的的新制度新服器必至怪气百出不见其利只见其害。然此非可轻易能奏功效者亦属事实。当于日常生活中习练熏陶之始能渐渍濡染易静的生活为动的的生活。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吾人即于日常生活中常悬一动的精神为准则、其结果尤不能完全变易其执性之静止。倘复偏执而保守之则活动之气质将永不见于吾人之身心、久且必归于腐亡。

（一）见甲寅第八期

（二）The Spirit of Chinese

愚顷又见早稻田大学教授北聆吉氏曾作《论东西文化之融合》文载于《东方时论》第三卷第六号中、多透辟之语。兹节译数段供参证焉。

……西洋之文化为求精神之自由、先倾其全力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欧人对于自然不能漠不关心纯取观望之态度。不能融合其自我于自然之中以与自然共相游乐。其视自然为自我发展之凭基、非自我产生之嫡母。自然者可以克服之障碍也。非西的谓对象即抵抗、实足为欧人自然观之纲领。彼等所以不即其本然之体以观察自然、而必分析之以求发见其构成之要素与轨范要素结合之法者、乃欲如斯以为人类再建自然。其科学的文明皆因其要求主张自我克服自然而产出。培根尝谓为“知识之力”盖欧人之科学即使彼等制御自然之力也。

然东洋诸民族关于此点其努力则与欧美人异。同是东洋民族其间固亦有相异之点、而自大体言之则凡东洋诸民族皆有一共同与西洋民族不同之所、即其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与自然融合、与自然游乐是也。彼等不言人则与天则对立、宁依天则以演绎人则。东洋人一般之宿命观以从天命为道德之能事、足为彼等如何视自然为强权之实证。东洋人与其欲制御自然以获精神之自由、宁欲使精神之要求服从自然、于此觅一安心之境地。故彼等对于自然不加解剖、不加分析、但即其本然之体观察之而已。

东西文化之差别可云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此殆基于二者使现实生活彻底之意力之强弱。欧美人使现实生活彻底之欲望盛、故向利用或征服于其生活必要之自然之途以进。东洋人之于现实生活不视为绝对、故使之彻底之努力缺乏。东西对于自然之差异无论其基于何种理由、究于二者之间生出思想与生活种种之不同。西洋人在与自然奋战之间养成一种猛烈之生活意志。初哉首基即利用此种生活之意志以使其他劣弱之民族为之属隶。更为此目的利用其独占之科学知识。东洋人常以求得最大之满足于其被与之境遇为能事。故于本民族中认

不法阶级之存在、即认异族为政治统治者亦甘受之而帖服。西洋人在与自然奋战中所养成之自我观念与人间中心之思想、构成一种价值哲学设便于自己之标准评量一切价值。不仅于现世以自己为中心、即于来世亦主张个性价值之保存。

希腊人受地理之影响本为极端个人主义之信者。以智慧、勇气、正义、节制为四德；而慈悲仁爱在东洋思想认为一切道德之首者则反屏之于道德范畴之外。今日之西洋人合此希腊人之个人主义与希腊教灵魂不灭之教义而成个性价值保存之哲学。从而西洋人缺真实大我之哲学。顾在东洋儒教则求修养最终之标的于天、佛教则求之于涅槃以成大我无我之哲学。宁以打破个人主义与人间本位之价值哲学、始足认为备哲人之风格、老庄荆楚之学于此点最为彻底。……

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为西洋人努力所向之方向。与自然融合对于所与境遇之满足为东洋人优游之境地。此二者皆为人间文化意志所向之标的。吾人于斯二者均不可蔑视。若徒埋头于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而忘却吾人对于内的生活之反省、则吾人之生活必归于空虚。故今世大哲若柏格森则谓今日普鲁士人之生活几全埋头于生产之事。于军事与产业方占胜利之际。诗与哲学益趋退化以为警告矣。若倭铿则以内的文明与外的文明、诗与产业之两立为理想。唱言今日人本主义的文明、一面征服自然、一面有使自己灵性归于空虚之恐矣。

彼欧美人今既于征服自然之中渐丧其自己之灵性、而东洋人则何如者？彼等既不求若何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故其与自然融和一致之精神不过仅为少数人所能知、自余之大多数殆为自然所征服。东洋圣哲自觉“破于此处成于彼处”之大自在。故现实生活之成败多不足以恼其心神。其大多数对于人生真义毫不理解、为自然所征服、又为利用自然者所驱使、以度量悲惨之生活。故于产生老庄解脱哲学之支那造成多数如豚之苦力。于产生释迦宗教之印度、其生民不苦于疾疫、则厄于饥馑、今且被佣为兵、在西部战场为英国人效死。然则无征服自然之能力、甘居于被与之境遇之东洋民族将有莫大之危险、从其生活以俱至。此为吾人所不可不记取者。

于是乃生欧罗巴的文化与亚细亚的文化之补救乃至融合之必要矣。吾人为自己精神的自由一面努力于境遇之制服与改造、一面亦须注意于境遇之制服与改造。不可无一定之限制而努力于自己精神之修养。单向前者以为努力、则人类将成为一劳动机械。仅以后者为能事、则亦不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场中。必兼斯二者真正人间的生活始放其光辉。而欲为此非能将一切反对之要素摄取而统一之之民族不可。自间固有之文化大抵因其民族之特质与其被置之境遇多少皆有所偏局。必有民族焉必于是等文化不认其中之一为绝对、悉摄容之而与以一定之位置与关系始有产出将来新文化之资格。若而民族于欧则有德意志、于亚则有日本。德人之天才不在能别创新文化之要素、而在能综合从来之一切文化的要素。日本人之天才亦正在此处。……梅烈鸠阔佛士基论欧罗巴的精神与亚细亚的精神曰：“渐向下沉之西方之光、地之真人之真也。渐向高升之东方之光、天之真神之真也。西方之光非必较东方之光为小、唯此二种之光二种之真相结合、始与真昼之光始与神人之光。”今且引述其言以终吾文矣。

按此篇所论颇多特见。而其主张东西文明之须相调剂亦与愚论无违。惟其谓具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者于欧则有德国、于亚则有日本、此则全为日人“我田引水”之谈、与其崇拜德国文明过渡之过。固执文明特质之民族固不易与反对之文明言调和、而能综合异派文明兼容并收之民族、固于异派文明之调和易与介绍疏通之助、愚亦非敢概为否认。但愚确信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二种文明本身各有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

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即介绍疏通之责亦断断非一二专事模仿之民族所能尽。愚惟希望为亚洲文化中心之吾民族对于此等世界的责任有所觉悟、有所努力而已。

(原载《言论季刊》)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屈 维 它

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若详细分析起来，其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和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正因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其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属于结果不同。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

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假使设此两种文化各自独立，不相关涉，便可以如此说。以得一确定的概念，然后更进一步：——先明瞭此两种经济制度之不同，两种制度的特性，然后看他们俩各自发展中的动象，以至于因发展而相接触，因相接触而起混合的演化，——便能得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形势；世界革命的渊源及其趋向。这是研究的方法，至于详尽的说明，不是一篇杂志论文所能了事，况且此处各篇幅所限，只能略略指明，以后再逐期详细讨论。

中国人，甚至于学者，所心爱的东方文化究竟是什么？

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

“中国之‘家庭手工业’，在城市之中，尚且还有不少保存着呢，——并且是在很老很大的商业城市之中。譬如宁波，有三十万人的居民，前一逗的妇女还是亲手制作衣履，以供夫子女之用。当时青年妇女，自己本亦能做女工，若竟向商铺购买此等事物，必定引起大家的注意，——以为怪事”。（见Dr.Nyok-Ching-Tsai, Die gewerblichen Retriehs for men der Stadt Ningpo! Tubingen. 1909, -p.51）这是十五、六年前的话。如今呢，比较僻静的外省外县，还不是如此？更不用谈到乡村了。农家手工业本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一。至于农业上之土地制度，义庄制度，族有制度等之宗法社会的色彩，尤其明显。记得二十年前的老太太们，若听见姑娘们要到店里面买鞋必定骂他们“无耻”、若看见洋手巾、铅笔，都说是有“洋骚气”。此种厌恶西方文化的态度，崇拜东方文化的旧梦，何等高傲，何等自大！其实中国木匠的鲁班祖师，秀才的至圣先师，不过是中世纪“行会”，“教会”式的文化。——假使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看见中国理发师手臂上刻的花纹，中国字画上，“世伯”“世兄”“年兄”“姻侍生”等的题款，必定很高欣，以为社会史上经济史上添了不少陈列馆中的材料。——所谓伦常纲纪，阴阳五行同样是宗法社会或行会制度的表征而已，并无特异的文化，更无神圣不可侵犯之处。第二种元素，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

东方其他各国的宗法社会现象，虽然各有特殊形式，与中国不相类，然而性质是一样的，也许色彩的浓淡相异而已，可是此地封建制度的遗迹，却很显露，比中国明显得多，田地制度，劳役制度处处都可以表现此等国家中经济上的封建遗迹。至于中国呢、难道完全脱离了封建制度？中国当初因民族斗争的结果，经济文化屡屡受外族的破毁，并为地理状态所限，经济上的发展至近代尚停滞于宗法社会之“半自然经济”，——这是屡进而又屡退的过程（此层意思将来再当详论，此处仅限于总观念），所以政治上虽屡见统一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并非真正的集权政府；不过以宗法社会为基础，承封建制度既经屡起屡仆、“诸侯”的力量薄弱，经济上的凭藉极不稳固，资本制度又为技术所限无从发生，那时所谓“资产阶级”仅得极小的一部分商业上的分配权，——所以君主得勉强建成“立于一盘散沙之上的‘中央政府’，——政府之下隶属无数的小经济单位，就是家族，百姓”。因此，“百姓”之中的“大姓”，“世家”，往往可以形成似贵族非贵族的阶级，而官僚，疆吏，地方官亦能形成似诸侯非诸侯的统治者。封建制度于政治上实未曾死灭，况且“改丁归漕”之法律上的实行不过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事，而“捉差”，“办差”等制，直到清朝末年还是存在，经济上又何尝可以说封建制度完全消灭于诸侯之后呢？新式社会，若无建设他的相当动力，是不能代旧式社会而兴的。中国独立的文化之中，经四五十世纪的历史，而竟不能求得丝毫类似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也就无足怪了。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透了一口气，可还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但没有完成，并且着手预备得也还很少。因此，封建制度的余势大盛；中国资产阶级的稚弱，统一君主的败落，各“地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及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用，——有此四端可乘，于是军阀割据制度成，而所谓“统一的”中国遂崩坏分裂。中国社会乃逆世界潮流，由“民主革命”反退向封建制度，现代中国的军阀制度所异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者不过两端：一、后者为自其原有的经济基础生长而成，前者乃攫得的此种经济基础于外；二、后者根据于采地制度农业经济，而前者根据于雇佣军队投机商的财阀；——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障碍。然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比封建诸侯更可怕，——依西欧历史的类似阶段而论，中国其实还没有封建制度，比封建制度还早一期，——正在由部落的首长时期，进于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呢，（此处当然是比拟而说，不可拘泥。）例如四川云贵湖南山西甘肃三省等，几乎全是一军征服之后渐渐依据地势强行逼迫商民，凭藉富地的经济势力，实行农奴制度式的劳役征调以剥削劳工民众，于是造成他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四川省内现时各军队之“保商”“护商”制度，——商人怕“匪”当初请他们“保镖”，现在落得反客为主，每次护商队“临幸”，商人反须贡献一大笔费用，往往超过所有货价百分之五十，颇与俄罗斯牌国史上商人请镖师，镖师变成“外国来的老爷”相像；福州“拉夫”办法几几乎完全恢复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捉差”制；京汉铁路，汉阳工厂，自从今年罢工失败后，实行军队强迫工作；其他残杀奸淫，拘禁拷掠，和封建时代的诸侯对待农奴的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劳工平民一概是为军阀经营生产交通的牛马；凡此都不过是最显著的实例，其他相类的事情，举不胜举。此等现象，——由所谓“自由”贸易（经济学上谓之“简单的商品生产制”）变成小诸侯辖制的商业，由所谓“自由”劳动变成公开的武力强逼的力役，——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骯脏东西，人间地狱？

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

东方诸国，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既落后，及渐与先进（文明）国家相接触，迎受西方文化，——资本主义，遂不得不成为此等国家的殖民地；而西方（文明）国输入资本主义的

形式，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西欧初发展时正是封建制度的劲敌，然侵略国外弱小民族之际，却往往辅助此等民族内部的封建制度，——其实是维持自己的统治权。凡是所谓强国，因其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要求，可以进而为种种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阴谋，务使殖民地的经济生活适宜他的剥削政策，所以维持殖民地内能代行其统治权的各派各阶级的势力。——直至完全克服臣属此等弱小民族为止。中国的地位尤其可危，——因有所谓“国际均势”，而成国际的殖民地；各强国得以联络各经济区域内的事实上的政府（军阀），以至于新生的大资产阶级，间接实行其统治权；其结果，军阀为互相争夺势力范围而时起战祸，列强亦因互争势力范围而阴谋倾轧賂买威吓，令中国顾东失西，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各国各势力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程度若有异，则其对待中国军阀或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亦就不同。中国的军阀既须有经济上的凭藉，每每能令其地方政府渐成资产阶级的发展之中心点，所以外国资本之占有此经济区域者，必从而役使之，利用之。同时，若是军阀凭藉经济势力的形式太鲁莽，——足以障碍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那时外国资本之较强者，能力贯于几省以上，就想除此障碍，而与内的大资产阶级携手。然帝国主义的性质唯在于：一、投货、二、搜括原料，三、投资、四、开发原料——凡此都是救世界的资本主义，于危亡所必须的程序，此中仅因其经济侵略力发展的阶级不同，而异其掠夺的方式，异其所维持之阶级——而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因为中国若是经济上真能独立发展，则帝国主义必受挤而颜覆。所以不论他是辅助军阀，或是辅助资产阶级，他必有一相当的限度，辅助至此而止，——力求合于他自己的目的。所谓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是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经济；所谓助国内资产阶级排除障碍，不但此等障碍专是外国经济在此发展的障碍，而且所助的“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譬如最近汉口的外国商人，趁京汉工潮的失败，役使湖北地方政府专门封闭工会之与外国企业有关系者，——是证军阀的制度始终大有利于外国资本；再则如上海镇守使确实是外国资本家的刽子手，外国资本家的报纸可以一面鼓吹中国资产阶级之所谓“裁兵理财制宪”运动，一面协同军阀竭力压迫一切平民之集会结社自由，甚至于市民（资产阶级）欢迎孙中山的大会都在禁止之列，更不论工会！——可见外国资本甚至与军阀同样采取极公开的野蛮政策。所以不论如何，帝国主义客观上自成为使中国社会退向封建制度的重要原因，同时又以强力纳入资本主义。一九二二年，上海金银行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嚼工人，——此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吞噬将活人当狐鬼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

宗法社会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而所谓“东方文化派”的学者还在竭力拥护。或者说，谈文化何必论到此等琐屑的“细毕”。然而要知道，所谓“文化”（Culture）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空间一定的空间中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作者”是人而非虚灵，不能离时向空间而独立。所以研究他的“所作”也自然有此程序。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伦常纲纪，孝悌礼教”的思想明明是宗法社会的反映，不必多论；“和平好让”更是因宗法社会中经济发展薄弱，虽争亦必能多得，祖孙父子兄弟伯叔在同一经济单位之中，求分配的相安，除此更无别法；中国的“天下四海观”，尤其是古旧的封建制度，崩坏，而经济发展刚到“简单的商品生产制”、不能前进，加上宗法社会的经济

组织，所以大家只觉得要“安居乐业”各人管各人的家事，各人做各人的生意，用不着集权的国家，如何能有国家观念？——只当着其他各国，其他各民族也和中国一样呢。若更说玄妙些，讲到东方人的习静养心绝欲诚意的功夫，尤其可笑。请问：在如此恬静的农村生活里，威严的君主政治下，求不到什么“物”，所以只好养“心”，不会满愁，所以只好绝欲，——是不是东方文化的优点？要知道罗马时代也有“天下观”，中世纪教会中也有绝欲主义，又是什么，奇珍环宝！诚然不错，我们决不否认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的基础，社会思想往往较其经济发展落后一步、所谓历史的“堕性律”；然而最根本的动力，始终是物质的生产关系。譬如中国经济发展，较之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然而北京总商会仍旧只有送万民伞的本领，福州市民甚至于打着白旗向领事馆投降，——这真是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之奴隶性的心理，崇拜君父的滥调，——若是此等幼稚的资产阶级能运用现时所有的一些实力，也决不至于如此。虽然，假设中国资产阶级具有极大的工厂，几万万的银行资本，他还肯如此俯就么？那时，恐怕此等敬长上不争夺的“美德”早已烟消云灭了。而此种物质力的自然发展，决不能以一纸唯心论而打消，决不能以仁爱的空名来限制，其实已经容不得你“预”防，——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长成，外国已经现成。帝国主义无孔不钻的潜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你爱和平，他却不爱，你讲诚意，他却不讲，你自己老实，他却不老实呢。

中国的文化，——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帝国主义的武器，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现在早已成帝国主义的鱼肉。我们也决不歌颂西方文化，——因为文化本无东西之别。文化只是征服天行；若是充分的征服自然界，就是充分的增加人类驾驭自然界的能力。——此种文化愈高，则社会力愈大，方能自强，方能独立，方能真正得自由发展。帝国主义处处阻滞此种可能；于殖民地上往往最初一期外国人似乎是文化的宣传者，然而只要看一看下列几项“琐事”，就可以知此种“宣传”的限度了：美国人在中国所设学校都授美国宪法，还不是些自由平等法律之类的原则！然而美国人克门私运银出境，犯了法被发觉，反与关卡兵士冲突受枪伤致死，美国政府却不惜以改变对华政策为要挟，庇护这一犯法的人。基督教青年会自诩为文化机关，教会了中国学生踢球，打球；等到和美国兵赛球时，赢了他的球就应该吃他巴掌，（北京）。此等税关法例球场规则，原来是中国人学来的，也可以说是极粗浅的社会共同生活的公约，而中国人却无福气实行。至于科学艺术也受限制，住在租界上的人，连看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要捉到巡捕房里去。请问“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主义在那里？帝国主义不但为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并且扰害殖民地的法治，竭力阻止殖民地人研究真正的科学，唯恐弱小民族因真得科学文明而强盛。

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科学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产儿，然而亦就是破毁资产阶级的起点。宗法社会的仁义道德说亦正是宗法社会破产的先声。至仁义道德说之真正的平民化及科学文明之真正的社会化时，就是一切旧社会的末日。此种文化过程，在先进“文明国”每每分为两段；因世界经济的发展其时尚有相当的余地，所以强国得以从容不迫先经所谓“民主主义”，而后重返于绝端反对民主主义的帝国主义，先经科学的文明而后重返于反对科学的市侩主义，非至于旧社会中的新力量勃生，彻底翻腾，——演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时，此种“循环论证”不能终止。至殖民地上，此种过程，却有不得不双方并进之势：——就是民族的解放运动，普通的民主运动，因厄于帝国主义之故，自然当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相融合而为一；于思想上即是道德之平民化与科学之社会化两阶段同时并呈，道德与科学本非相消的。只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学是颠覆东方文化之恶性的利器。此种恶

性：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颠覆之后，方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

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直至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宗法社会的思想代表还正在竭力拥护旧伦理，世界资产阶级也反过来否认新科学。这也难怪，原来他们俩，一在殖民地上，一在强国之中，都已魂游墟墓，看不见前途，所以不得不向后转。世界的资产阶级，既以科学的发明，作为少数人享福之用，他眼看着用了这许多精力，杀人放火的机械制造得如此之精明，始终还是镇不住“乱”。保不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他的结论是“科学无能”。刚刚迎合了宗法社会的心理，于是所谓“东方文化派”大得其意。其实那里是什么“科学破产”，不过是宗法社会及资产阶级文明的破产罢了。世界的无产阶级正应当用敌人所怕的武器；殖民地上的劳动平民也应如此。世界的资产阶级及殖民地上的贵族阶级已经没有能力，——为他们所依附的经济制度（私产制及自给经济）所限，——不能再进，自己不能克“物”、所以不得不教人“克己”。难道受压迫者便真听了他们“克己”，讲唯心主义么？因此可见，颠覆一切旧社会的武器正是科学。科学只是征服天行的方法。在少数人垄断此种方法之结果的社会里，方法愈妙，富人愈富，于是社会中阶级斗争愈剧烈，国际间战祸愈可惨，因此以为是科学方法本身的罪恶，假设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应用科学，则虽有斗争亦自能保证将来发达进步之可能，——只因此等进步已非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而是无产阶级文化的进步，所以资产阶级要否认。等到私产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要达到此种伟大的目的，非世界革命不可，——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结论，有客观事实可按的。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祸，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况且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若是东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从事于一切革命运动，断绝一切帝国主义的“辎重队”，使无发展余地，亦必暂限于停滞状态。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当令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乘现代各地生产力发展之矛盾性，凭客观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斗争，即此锻炼其主观的阶级意识；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这一方针固然非常之明确，然而实际运动之时，尤须时时不忘科学的方法，缜密的考察，因时因地而相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相应的方法，以及东方民族内部运动之阶段，都必须极慎重的研究。现在且献此初步的尝试，——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所通过的东方问题之题要——看一看，便可先得一总纲领。

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

瞿 秋 白

—

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虽然，上海固然天天有机器进口，京沪汉湘奉直之间固然天天有火车来往，乡间的纺纱机固然一天一天的少下去，平民人家的豆油灯盏固然一天一天的暗下去；不但二三十年前洋场上的“轧妍头”早已经会审公堂的默认，就是现今清高的士族女儿“跟人逃走”的也算不了什么事。

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我愿意来试一试，做第一步的根本的研究，——且先说明“文明”的本质，暂时不涉及什么东和西。

文明(civilization)是人类劳动的创造；原始时代的人初向自然进攻，便制成极粗的工具，如石斧以至于弓箭，那时便是技术的开始，亦就是文明的开始，当时若说不要这种文明，便是愿意葬身虎腹或是活活饿死。可是既有制作工具的技术便精益求精，技术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顺流而下”是生物求生的趋势，轻易阻遏不得。仍旧要等技术自身的发展超过一定的限度，社会里才不期然而然又有转移文明的新活力发现。因为：（一）石斧弓箭的制作方法可以被少数人专利，——草昧时代的技术往往是偶然无意之中碰到的，首先发明的人，可以垄断“世授”甚至于托之于神话，譬如中国行会里各行的祖师之类，便是这种遗迹；（二）因此，社会里发生了组织的分工，有所谓酋长巫祝儒牧等人，那技术文明原本是发展社会进化的，到此反成阻滞社会进化的赘疣。——于是受治与治者之间便各有非常明显的对于文明的不同态度。不但如此，技术若受外缘的影响，——如地理的关系，民族之间的接触等，——发展得分外快，那时社会经济的激变能令受治者一面受新技术的训练而强盛，一面渐占社会里举足可以轻重的地位，于是突出当时旧社会关系的范围，而创造新文明。此际冲突剧烈，演出革命的现象，若竟毁坏旧文明的小部分，那亦是必然的结果，或者还是创造新文明的必要的条件。

世界的文明。经过儒牧神甫而达智识阶级，从石斧弓箭至飞机潜艇，一般的是技术上的职员，一般的是克服自然的利器，然而人对他们的态度却可以大异而特异。这正是因为上述的种种变化原因。人类有工具而营共同生活，是文明的开始；因有文明而阶级分化，于是共同生活不得和谐——亦就是文明的末日。可是，实际上说来，文明并无末日，受治阶级正要夺取此文明以为利器而创造新文明——那不过是治者阶级的末日罢了。法国革命前后，中世纪末，处处都曾经过这种斗争，资产阶级的新文明便代封建制度的旧文明而兴起了；然而并不曾因为贵族曾经住房屋穿衣服，新兴的第三阶级便毁尽了房屋，撕尽了衣服。俄国革命之后，世界的无产阶级文明的创造已经开始；亦并不曾因为资产阶级用电灯，便把电灯打破……可见文明仅仅是人对于自然的威权，运用这威权的人不同，文明的内容亦随之而变易；至于

文明本身，始终是生物的人类所必需的。只有垂死时的治者阶级，觉得进步可怕，——可以危及旧社会关系，所以才高呼“向后转”，还要自命为精神文明。其实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副产；譬如说，现在的自由恋爱运动还可以说是某某人提倡出来的，那早于自由恋爱的“轧妍头运动”却是“洋场”的自然结果；礼教式的文明难道一定要等陈独秀，胡适之的《新青年》才倒？

由此可见，对于现代的文明——技术文明，明明是增加人类威权的文明，却有反抗派，(opposition)而且可以分两派；一，便是古旧的垂死的阶级，吆唱着“向后转”的；二，便是更新的阶级，不能享受文明而想导此文明更进一步的。

二

现在且就这技术文明的本质推论，所谓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实际上说来与东方文明毫无区别；中国的舟车宫室与西方的电灯电话只有数量程度上的不同，一般的都是征服自然和增高人类权力的利器。可是，对封建制度或宗法制度的文明与资产阶级的文明相较却有内容的不同，——前者神秘的份数多，后者科学的份数多。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文明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有一特异之点：就是思想上不承认君权，神权，父权，师权，——中国的所谓“天地君亲师”一概扫除；学术已非“祖传”或“神授”，而是理智的逻辑的；技术亦就不专赖熟练或天才，而渐重原理。具体的说，便是：不要黄帝内经和汤头歌诀，而要生理学，病理学，药品化学和医术。所以科学文明很有民权主义的性质，人人都有发明真理之权，只要你有这本领，——完全是个人的自由。然而事实上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因此新文明的影响而更不平等，所以思想上的民权几乎等于纸上谈兵，——科学使人享法律上的平等而消失事实上平等的可能，科学文明使人类社会的阶级分划得更清楚。于是人对自然的威权愈大，治者阶级对受治阶级的威权亦愈大，——受治阶级就不得不求尊重科学文明以打破旧社会制度，使封建社会的神秘性完全舍净，将资产阶级的科学性引导到底，彻底显露那艺术性的文明。然而这还是后话；如今言归正传，只要说明：对于物质文明，现代的受治阶级——无产阶级亦取反对的态度，不过与贵族阶级大不相同。

物质文明是技术，科学仅仅是从技术里抽象而得的总原理；技术有神秘性便是封建时代的文明，技术有科学性便是资产阶级的文明，技术更进而有艺术性便是无产阶级的文明。然而统此三期的技术文明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且概括而论，单就客观论断。

三

对于技术文明可以有两种绝对不同互相反对的观点。

一种便是以为技术的进步渐渐将人类从残酷的自然威权之下解放出来，使人更强健更能干而且更幸福，——无条件的承认是如此。别一种观点却恰恰与此相反。

中国的老子便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显然是反对物质方面的发展的。

基督亦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都用不着关心，用不着问；——不要想那明天。”（马太第四章）

罗马的古文学家亦非常之厌恶城市文明，说城市是奢侈纵恣，万恶之渊藪，而歌颂农村生活的简朴。（华龙Varron）

十八世纪，真正的城市方才开始发展的时候，英国文学思想便有一派反对。然而最激烈